

(上接 A2 版)

圆桌讨论

眼科医生如何面对变化与挑战

前浪：为“后浪”创造包容、理性、公正的环境

张艳萍：请问赵家良教授，作为一名“前浪”，如何为“后浪”创造包容、理性、公正的环境？

赵家良：作为一个成熟的高年资眼科医生，我非常希望一批批“后浪”茁壮成长，只有这样，我国眼科学事业才能不断发展。作为一名“前浪”，首先应为“后浪”创造包容、理性、公正的工作氛围和成长环境；其次，是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在不断的历练中得到成长。只有这样，才能使科室、学科得到更好的发展。

中浪：承上启下 制定发展方向 培养人才梯队

张艳萍：请问王宁利、陈有信教授，作为“中浪”、作为一名权威专家，如何承上启下，制定发展方向，培养人才梯队？

王宁利：培养过硬的人才梯队，是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义务。为此，分会特别成立了致力于学科发展、人员培养的委员会，也建立了眼科的规范化培训专家组。但同时，“后浪”的领导力也迫切需要得到提高，这就需要广大“前浪”的努力。“前浪”不推，“后浪”行不了。所以陈有信教授在担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秘书长的时候，继承了亚太眼科学会以及国际眼科理事会的传统，启动了“中国眼科未来领袖发展项目”。

陈有信：谈到对后辈的言传身教，我想再分享关于赵家良教授的三件小事：第一件是赵家良教授担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主委期间，也担任《中华眼科杂志》的主编，当时，尽管工作繁忙，但他仍会逐字逐句地审阅、修改每篇稿件；第二件事是赵家良教授2002年参加全球华人眼科学术大会时，背着一个大书包，里面不仅装着各种参考书籍，还有两部电脑；第三件是2002年9月，中华医学会第八届全国眼科大会在西安召开，这是我国眼科学界在进入21世纪后的第1次盛会。此前，我国学术会议的规模大多在千人以下，但赵教授力主与国际接轨，不仅邀请了来自美国、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专家参会，还创新性地开辟了10个会场。同时，他在推动我国加入国际眼科理事会（ICO）和亚太眼科大会（APAO）方面，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仅赵家良教授，很多眼科学前辈都为中国眼科的发展倾注了毕生心血。他们严谨的工作作风，认真、踏实、不走捷径的工作态度，值得我们毕生学习。

后浪：学会担当，提升职业幸福感

张艳萍：请问三位“后浪”，如何找到自己的突破口，如何超越“前浪”？

王丽强：作为一名“后浪”，能够有前辈们无私地为我们提供宽阔的肩膀，为我们指引方向，带领我们不断前行，实属一件幸事。他们不仅教给我们知识，也教给我们怎样去做人——正如赵家良教授所说：一名优秀的眼科医生必须德才兼备，德行不好，再有才能也难有大发展。我也将把这句话作为我职业生涯的灯塔，努力做一名优秀的眼科医生。

王怀洲：作为王宁利教授到同仁医院后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我在成长的道路上得到了老师很多鞭策，而这种鞭策，是对我最好的提携。

“前浪”的作用很大，在眼科学事业的求索之路上，王宁利教授走得非常快，也为我们这些“后浪”留出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让我们得到更快的成长，有了更大作为。

作为一名“后浪”，在我国眼科学事业高速发展、从弱变强的大背景下，我们要迅速找到自己的定位，不仅要做到国内领先，更要不断追求、挑战国际领先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在我国眼科学事业发展的江河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翻起我们一代人的浪花。

林浩添：作为“后浪”，我们这代人有幸成长在国家快速

发展时期。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眼科学事业的发展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一个缩影。

在眼科学领域，从高新技术“引进来”，到“自己做”再到未来的“走出去”，摆在“后浪”面前更多的挑战就是如何在国家发展的新时期，通过不断的创新，突破眼科学技术发展的瓶颈。我们也希望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规划，更好地跟国际接轨，培养更多德才兼备、有家国情怀、有领袖气质的人才。



线上线下圆桌讨论



中浪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王宁利教授

关于目标、选择与榜样的三个故事

我想讲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名叫目标。在我刚刚成为一名眼科医生时，有一天和主任看到几位拄着盲杖的盲人在路人的搀扶下过了马路。主任对我说：如果有一天，一位眼科医生能让他们把盲杖丢掉，像正常人一样过马路，他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眼科医生。

诚然，迄今为止，眼科学仍无法帮助所有盲人丢掉盲杖，但我国防盲治盲工作的开展，却帮助很多人远离了盲杖。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坚定目标，即使无法实现，也不会迷失前行的方向。

第二个故事名叫选择。20世纪80年代，青海省影像学人才奇缺，我也得到了一个公派前往欧洲学习影像学的机会。我为此苦学英语，还考取了一张英语专业的大专文凭。但最后关头，我扪心自问，我学习英语是为了出国还是为了进步？答案很简单：为了进步——我不能放弃我的专业，不能忘记我的追求。

在报考研究生时，我再次面临选择：当时，考虑到西北地区眼外伤患者较多，我报考了第一军医大学（现南方医科大学）的研究生，没想到却在“百万大裁

军”的浪潮中，辗转来到了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并经过重新笔试，成为我国著名眼科专家周文炳教授的学生。可见，事业发展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靠着坚持不懈，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第三个故事名叫榜样。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周文炳教授、吴乐正教授、吴德正教授、陈家祺教授、毛文书教授等一批优秀老师的谆谆教诲下不断成长。当时，吴乐正教授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国际会议上作报告的身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便以他为榜样，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站在国际舞台上，用英语作一份由中国学者完成的报告。

我做到了。2014年，我当选为国际眼科科学院院士，也应邀前往多所世界一流医院、医学院校，在国际眼科学学术的舞台上发出了“中国好声音”。所以，人一定要有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如今，我已正式迈入了“中浪”的行列。作为一名称职的“中浪”，我不仅要学习、传承“前浪”的精神财富，也要为“后浪”做出表率，帮助他们不断进步。让自己的生命发光，照亮自己，照亮别人。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 陈有信教授

遇见 奋斗

1993年9月，我遇见了协和与恩师张承芬教授。当时，我最喜欢的就是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图书馆，同院士、前辈们一起自习。也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我偶然了解脉络膜血管造影技术，并通过努力使中国拥有了第一台Rodentstock SLO，开启了吲哚菁绿脉络膜血管造影（ICGA）在眼科的运用。

20世纪90年代，北京协和医院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术已有了较高的水平，但由于设备欠缺，ICGA技术迟迟未能得到开展。看到彼时的情况，我在较短的时间内，大量查阅资料，并在攻读博士学位第一学期期末，写出了三篇关于ICGA的综述交给张承芬教授，她看后非常赞成我开展这项工作。

老师的肯定给了我干就干的勇气，但设备缺乏是摆在眼前的第一道难题。几经辗转，当时的对外贸易合作部终于同意购买一台当时国际最先进的Rodentstock SLO，医院通过以租赁的方式使用。虽然对外贸易合作部以最低的利息将机器租给医院，但150万的租金对于当时无疑就是天价！

顾不了那么多，当时想的是有了机器就要尽快派上用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国内连机器

都没有，何来染料？正在发愁时，《中华消化病杂志》上一篇关于ICG做肝功能检测的信息给了我，我希望，我立即写信联系生产药物的厂家：“我是眼科医生，希望获得该药物。”然而，装满药物的快递直接寄到了药剂科，等待我的是药剂科主任的一顿“臭骂”：“你们能自己进药？药物要经过认证才能确定是否能够被纳入。”后面的故事还有很多，但总归ICGA于1995年在眼科成功得到运用。

2001年，我于美国南加州大学Doheny眼科研究所博士毕业回国，开启了为中华眼科学分会服务20年之旅；2015年，我遇见了一批年轻人，与他们开展了眼底激光的研发；2016年，我遇见了AI，开展了医工结合的形式，并成立了眼科智能创新重点实验室；如今，我遇见了5G，开展远程激光治疗探索的足迹……

岁月沧桑，流年无恙，一不小心，我从当年意气风发的小伙变成了头发发白的中年人士，如今我也有了自己的学生，我时常感慨并教导学生：遇见并非巧合，遇见名师更需要坚持与抓住机遇去奋斗，只有这样才会遇见彩虹和不一样的天空，成就自己的绚烂人生，“为眼科事业奋斗终身”的精神也才能因此而传承。